

窦大哥精神还好



黄洛峰

这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内部同仁的一封信“家信”，是远在香港的黄洛峰（化名远昭）写给刘大明的信。刘大明当时在太行山深处敌后抗日根据地奉命开办华北书店，他们用特有的内部“暗语”进行交流，互相通报信息，交流情况，看似谈生意、聊家常，实际上在说只有他们能懂的关于书店、关于各位同志的情况，是一封特殊形势下的“家信”。

大明吾弟：

九月二十八日信收到了，真是欣慰不已！

诚如你所说，总怕收不到信，就没有给你信。因为很久没有给你信了，一想起来，总是难过不已。而今，千言万语，从何说起呢？

春天曾发一电，因为你常走动，正不晓得已否收接？文兄^①去陕，已得知。因为各种原因，辰夫^②、崇基^③他们也一直没有通信。所以辰夫的情形怎样，也就不太知道了。

① 文兄，即李文，原名李济安，原任重庆生活书店经理。1940年被派往太行开办华北书店，1941年4月奉延安电召，赴延安与柳湜等开办延安华北书店。

② 辰夫，即柳湜，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，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主编。抗战期间曾和邹韬奋合编《全民抗战》周刊，后调延安创办华北书店，不久又调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。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与洛峰中断了联系。

③ 崇基，即艾思奇，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，《大众哲学》一书作者。抗战后由上海调延安工作，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、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总编等职。在延安期间曾为汉口、重庆的生活出版社积极组织稿件，有多种书在重庆出版。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与洛峰中断了联系。

家林^①一直还在病着，汉清^②的一个小弟弟^③最近又病了，窦府^④真是多灾多难。但是窦大哥精神还好，虽然事情不大如意，此病彼病，他还是很精神的挣扎下去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引以为慰的。

良才^⑤少卿^⑥合开了一店，生意还好，下月良才就要出来办货。老万^⑦带着他的小用^⑧宝^⑨，要回家，不久可以到此。阳章^⑩同文彬^⑪在文彬家乡开了一个文具店，最近因为生意不好，公司要集中钱，做进口生意，他们那个店收歇了，阳章不久就到少卿那儿去。汉清的事业做得较好些，但是因为近来他弟弟病，使得他也弄得苦起来。郑权^⑫到缅甸做生意去了，他们公司，以后打主意多做点南洋方面的生意，因为那边好做，钱又值钱。这些，就是一些老朋友的消息，我想你是很喜欢听到的，所以不嫌啰嗦了一串了。

我们的渝店，今年又遭炸，三楼塌掉，修补修补，又用掉几千，生意还可以，只是货物少。最近打主意恢复学习杂志，以后生意或可

① 家林，即孙家林，1938年在汉口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。1939年任读书社和新知书店在贵阳合办的“读新书店”经理。

② 汉清，即张汉清，1936年在上海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，1939年任桂林分社副经理。

③ 小弟弟，指倪子明，1939年在桂林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，1941年随张汉清到广东曲江开办中南文具公司时被捕，经营救出狱。曾任成都分社经理。

④ 窦府，暗指读书生活出版社。

⑤ 良才，即陆良才、陆家瑞，1938年在汉口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，1940年曾任成都分社经理，此时在桂林与刘少卿合开建业文具公司。

⑥ 少卿，即刘少卿、刘耀新，1938年在汉口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，1939年在成都参与分社的筹备工作，后又到重庆参与书店工作。

⑦ 老万，即万国均（1906—1974），1936年秋到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，后一直在上海、汉口、重庆、贵阳、桂林、香港等地奔波，协助洛峰办理重要社务，是黄洛峰的得力助手，相当于总社“经理助理”。

⑧ 小用，即范用，1938年在汉口入社。

⑨ 宝，即丁仙宝，范用夫人。

⑩ 阳章，即欧阳章，1938年在汉口入社，时在昆明与岳文彬同办昆明金碧文具公司。

⑪ 文彬，即岳文斌、岳世华、岳质君，1940年1月在重庆入社，皖南事变后离重庆到家乡昆明和欧阳章开办昆明金碧文具公司。

⑫ 郑权，即郑树惠，1938年在汉口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，此时任昆明分社经理。

好些。锡棣^①帮同一个吴兄^②在做，吴虽做生意不久，但年龄比锡棣大，经验多，也还可以做得下去。上海造过的货，他们重新仿制翻造，一个月多少出些货色，也还有些买主来照顾。

留耕^③的家用，因为生意不好，社里暂时仍只能照以前的拨付。他哥哥曾经找过麟^④兄，但麟无法，答应以后想办法。如便，望能告留耕。

你要的东西，此间不收寄，已函沪店寄你。但是否能收到，也还是问题呢！？

好久不通信，等于隔了几十年一样；以后，我想多给你信。

专此祝你

安好！

远昭^⑤

卅年十一月十二日

来信交香港邮政信箱 1048 号可也。



背景链接

读书生活出版社，后称读书出版社，1936年由李公朴、柳湜、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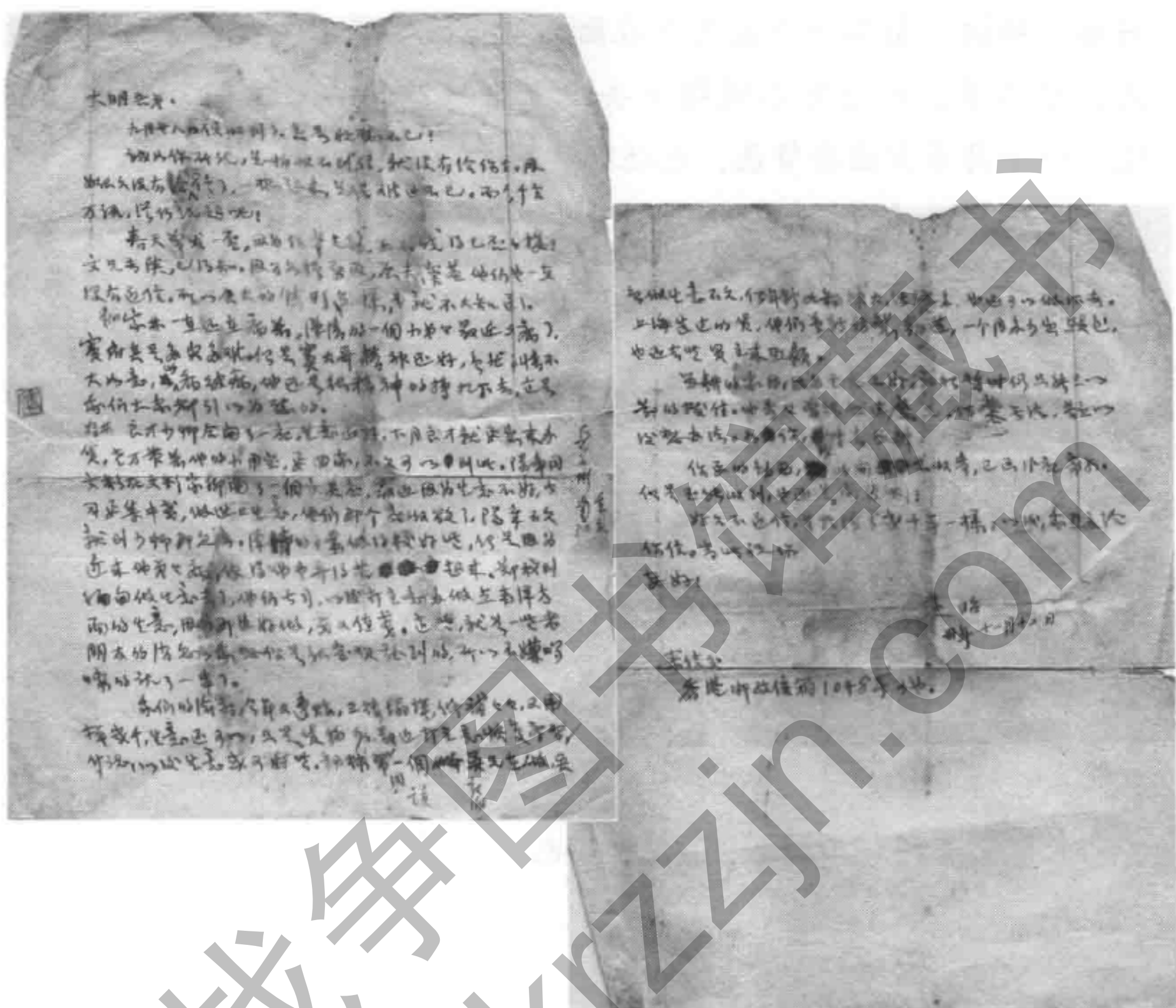
① 锡棣，即王锡棣、王晓光，1938年在汉口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，此时在重庆主持自强出版社，并投资立信会计图书社，属于二线安排。根据周恩来的指示，三家书店必须划分一、二、三线三条战线。二线是在另一些地方原来的机构已无法立足的，可以改名换姓，另起炉灶，或与别的出版社合作，建立新机构，以避免损失。

② 吴兄，即吴毅潮、吴葆铭，1940年由湖北到重庆入社，皖南事变后，抱病负责编辑工作，并兼顾社里的经营管理工作，乃至开设纸行，经营纸张，以弥补亏空。

③ 留耕，指刘大明，原名赵刘根，1921年3月9日生于上海徐家汇天钥桥路赵巷，1936年参加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时改名为赵子诚，1940年由重庆赴太行山华北书店时，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改名为刘大明。

④ 麟，即刘麟，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。

⑤ 远昭，即黄洛峰（1909—1980），云南省鹤庆县人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4年同李公朴等人创办《读书生活》杂志，后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，任总经理。



思奇等创办于上海。前身是李公朴主编的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，后由黄洛峰任经理。1937年10月迁汉口，1938年10月迁重庆，并在广州、贵阳、桂林、昆明等地设立分社。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《哲学讲话》，发行不久即被查禁，修改后更名为《大众哲学》继续出版，成为该社的畅销书。该社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著作，并翻译出版多种苏联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以及少儿读物。后该社与生活书店、新知书店合并成为三联书店。抗战时期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抗战的出版物，成为国统区代表进步出版势力的一个重要单位。

在黄洛峰的主持下，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、王亚南合译的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及郭大力译的《剩余价值学说史》，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。

1941年，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，向邹韬奋建议，生活、读书、新知三家书店联合起来，到延安和敌后去开办书店。三家书店的负责人一起商议，“生活”派李济安前去，并由他全面负责，“新知”派陈在德，“读书”派赵子诚。8月初，三人集合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，换上了八路军的军服，佩戴上八路军胸章、臂章，并改了名字，李济安改称李文，陈在德改称王华，赵子诚改称刘大明，他们的名字沿用至今。

他们乘卡车从重庆出发，一路颠簸，经成都、广元、汉中、宝鸡到了西安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林伯渠的接见。为了等候过封锁线，在西安住了一个月，才奉命到洛阳与护送他们的八路军汇合，过了封锁线天井关。又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，于11月初到达山西辽县（今左权县）南35公里的桐峪八路军野战总政治部所在地，沿途受到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、支队唐天际司令员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接见。

到桐峪后，遵照罗瑞卿主任指示，他们在华北《新华日报》同志的帮助下，决定先在根据地中心桐峪开设一个门市部，经售边区出版的书刊和文具，并用油印方式刻印一些文艺小册子。三人分工，王华负责门市部筹建，李文负责采购文具用品并和刘大明负责刻印油印小册子，刘大明负责油印刻印工作，赶印了1941年月历，又将高尔基的两篇名著《海燕》和《鹰之歌》刻印成一本，取名《鹰之歌》，作为门市部开张的礼物。他们精心设计了开本、版面、用纸，月历的封面还进行套色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当时，读者看惯了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比较单调刻板的装帧，此时见到了《鹰之歌》，犹如在荒漠戈壁滩中看到一朵挺拔的小白花，觉得分外可爱。

开业之日，正是元旦假日，附近总部各机关的干部、群众，纷纷从几里、几十里以外，像赶集一样，到桐峪来游玩，看见书店新开张，都到店里看看，顺便又买些文具纸张之类，不几日，《鹰之歌》即销售一空，500份月历也销售大半。

1941年10月，李文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开办了华北书店，太行华北书店就由王华和刘大明负责。到1942年秋，共出版了20余种像《鹰之歌》这样的小册子，其中除了鲁迅的著作外，大多是苏联和俄国小说。其中也有几种是边区作家编写的，如《世界名歌选》，是129师文工团团长刘流同志编的，《拉丁化检字》是边区文联主任陈默君同志组织编写的。

这些小册子，在版式方面都不断地进行改进，如版面大些、小些，文字直排、横排等，在封面上根据内容设计，尽量使其有特色，有的小册子还加上了一些评介式的后记，对读者不无裨益。小册子的印数一般是500份，也就是当时蜡纸所能承受的最高印数了。那时，每决定印一本书，刘大明就日以继夜地刻蜡版，他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，由于长久握铁笔，始终是扁平和疼痛的。当时油印的小册子有：《1941年月历》《鹰之歌》《阿Q正传》《狂人日记》《故乡》《朝花夕拾》《不走正路的安得伦》《死敌》《第四十一》《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》《和列宁相处的日子》《二十六个和一个》等。

这封读书生活出版社的“家信”是黄洛峰接到9月28日刘大明给他的信的回信。刘大明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后，想要的纸型一直没有收到，他们很着急，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黄洛峰同志写了信，当时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以后，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陈学昭《延安访问记》的纸型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查获，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据此“请”黄洛峰前去“谈话”，结果纸型被没收，人也被扣留一天始释放。黄洛峰无法在重庆继续活动，不得不秘密出走香港。刘大明的信他是在香港回的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信中他使用了大量的“暗语”进行交流。他介绍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各位同仁的情况，说到某某病了，那就是指他被捕了，如“家林一直还病着”这一句，就是孙家林在1941年2月在贵阳担任“读新经理”时，书店被国民党查封，他和店中其他五位同志被捕，后由他的未被逮捕的爱人刘瑛同志寻得机会，“内应外合”，逃离了监

狱，径赴昆明。“汉清的一个小弟弟最近又病了”，是指倪子明 1941 年在广东曲江开办中南文具公司时被捕。

“窦府真是多灾多难”这里是取的谐音“读社”，是指读书生活出版社，这时内地四个分社全部被封，多人被捕，财产损失惨重。“但是窦大哥精神还好，虽然事情不大如意，此病彼病，他还是很精神的挣扎下去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引以为慰的。”窦大哥可以理解为是洛峰同志自称，也可以理解为“读社”领导核心、领导层，包括在上海的郑易里等同志。虽然这里被封，那里被抓，但我们事业的领导层精神很好，仍然在顽强地坚持斗争着。

“上海造过的货，他们重新仿制翻造，一个月多少出些货色，也有些买主来照顾。”这指的是当时上海分社在郑易里等同志领导下，出版了多种书籍，并不时将样本转重庆翻印。

信中黄洛峰与刘大明交流共同的事业，介绍了许多情况，并且也很关心刘大明，表示对于他家的困难，能帮助就一定帮助，充分体现了同志之间互相帮助、领导的亲切关怀之情。因为刘大明远在太行深处的华北书店，在根据地为广大敌后抗日群众服务，传播抗日救国的真理。但是根据地出版刊物的条件有限，刘大明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还会请求黄洛峰帮忙，由于国统区条件比较特殊，日本未占领的地方也有许多对于进步文化事业的限制与迫害，他们不得不出许多办法进行工作，在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是十分尽心尽力的。对于刘大明的请求黄洛峰是非常明晰的，对他要的东西，说“此间不收寄，已函沪店寄你”，由于战争环境，“但是否能收到，还是问题呢”。在信的最后表示，他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着抗日的工作，彼此虽分开才一年多，但是觉得分开好长时间了，“好久不通信，等于隔了几十年一样”，可见在战争环境下，看到一封这样的“家信”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（乔玲梅）